

湯漢：第七位華人樞機

柯毅霖著 傅蔚琳譯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八日，教宗本篤十六世擢升七十二歲的香港教區主教湯漢為樞機。他是教會史上第七位中國籍樞機，亦是首位在香港出生者。及後湯漢亦獲得教廷多項重要任命：四月二十一日他奉委為萬民福音部及宗座與各宗教對話委員會的成員；七月二日，他成為同年十月在羅馬舉行的全球主教會議三位主席之一。教宗還任命他出任監管梵蒂岡財務的委員會成員。

在擢升典禮當日，香港教區的報刊向香港的信友及政府發放了兩個訊息。新任的樞機呼籲信

眾為信仰作見證：「我們應該尋找機會，運用我們的時間和金錢去幫助別人，尤其是社會中的弱者和被邊緣化的人。」在給予香港政府和各政治機關的公開聲明中，湯漢樞機強調：除了在政策上照顧社會中最弱的社群以及關注房屋、醫療、教育和養老金等福利以外，香港還需要踐行全面的民主制度、一人一票直選及由普選產生行政長官。「每一個政府都有一個具體的責任，按照社會公義的準則，協調各方面的利益。」

湯樞機於三月二日的記者會上表示，自己曾

呼籲中國官員賦予人民更大的宗教自由。如果中國的天主教徒能夠在信仰與宗教活動方面享有充分的自由，則不但更能貢獻社會，也能使祖國在國際社會中獲得更高的聲譽。香港方面，他表示香港教區致力於「建立一個尊重人的尊嚴和特別關顧弱小者」的社會。他亦希望新一屆的香港政府能夠帶來民主和社會政策的發展。

湯樞機於三月三日的感恩彌撒中提到，香港教區將繼續發揮「橋樑」的角色，幫助內地教會發展培育，達致修和，並實現與教宗及普世教會的完全共融。中梵之間的對話因二零一年兩次非法祝聖主教的事件而被打亂，教廷被迫宣佈兩位非法祝聖主教逐出教會。他請信友們加強祈禱，「使那些被逐出教會的非法主教能早日悔改，與我們的教會修和，使教會的傷口可以癒合。」

一個非天主教家庭的長子。他的母親來自澳門，年輕時在嘉諾撒修女設於堅道的書院就讀。一九三四年四月，出任駐中國宗座代表的蔡寧總主教（Archbishop Mario Zanin）來港訪問，曾探訪該學校，修女動員全體學生歡迎。湯漢的母親雖非天主教徒，卻被校長（Sr. Anderson）選出來代表學校獻花。湯樞機憶述：「母親一再向我們講述這件往事，並且總是感到非常自豪和榮幸。因此，她非常尊敬修女，特別是校長修女。雖然她沒有要求接受洗禮，但對教會常懷有好印象。」

湯漢兩歲時，正值日軍侵佔香港，他們舉家遷往親友聚居的澳門。湯漢後來被送到廣州，與祖母同住，直至戰爭結束。當戰爭終於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結束時，他在廣州與家人重聚，可惜任職會計工作的父親已經患上了肺結核。

在戰後的數年裏，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中國北部爆發激烈的戰鬥，許多受傷的士兵和難民逃至廣州，年輕的湯漢目睹瑪利諾傳教士對這些人

戰亂的童年及政治動蕩的少年期

湯漢是一九三九年七月三十一日生於香港

的憐憫和愛心，特別是對本堂司鐸馬奕猷神父印象深刻。馬神父介紹湯漢到天主教明德小學讀書。他得到獎學金和獲豁免全部學費。湯漢憶稱：「我的整個生活都得到教會的支持。我是一個由教會撫養成長的男孩。」至於聖召方面，馬神父的好榜樣亦感動了湯漢，使他覺得成爲神父是一件好事。共產黨在中國掌政後，教會遭受打壓，湯漢接受了多位神父的建議到澳門去探索聖召。他的父母信任教會，同意讓他離開中國。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歲的湯漢離開中國和他的家人，前往澳門進入修院。不久，湯漢的母親和弟妹亦相繼返到香港。湯漢的父親死於一九五二年，時年四十二歲。湯漢最親愛的母親於二零一一年在香港逝世，終年九十一歲。

在澳門、香港和羅馬接受培育

一九五七年，湯漢在澳門完成了高中學業，到香港聖神修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一九六四年，

他獲瑪利諾傳教會宋化民神父資助，前往羅馬宗座傳信大學攻讀神學。當時正值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湯漢可以說是沉浸在羅馬的特殊氛圍之中。在大公會議閉幕後一個月，教宗保祿六世在一座傳信大學獲取神學博士學位。回港後至今，他一直住在聖神修院。從一九七零年起，他一直教授神學和中國哲學，並在七十年代擔任神學部主任。湯漢亦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中國哲學，取得碩士學位；他曾應邀在神學期刊 *Concilium* 發表論文，並獲邀在各國際會議中作公開講座。

一九七九年，胡主教與教區當局構思開設專責關注中國教會事務的新機構，於是在一九八零年成立了聖神研究中心，由湯漢神父擔當主任，至今未變。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香港爲中國教會所擔當的橋樑使命日益明顯。湯樞機說：「這任命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因爲我需要外訪和參加更多的國際會議。我開始被世界各地對中國

感興趣的人所認識。很多人會在往訪中國之前與我們聯繫。」在聖神研究中心的歷史中，世界各地許多主教和知名人士都曾來訪，其中包括教廷國務卿卡薩羅利樞機(Card. Agostino Casaroli)，以及拉辛格樞機(Card. Joseph Ratzinger)，他就是後來當選教宗的本篤十六世。

一九九二年，胡樞機任命湯漢為教區兩位副主教之一，他擔任了副主教之職共十七年。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九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他為香港教區輔理主教，並與教區助理主教陳日君一同晉牧。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二零零八年一月任命他為香港教區助理主教，並於二零零九年四月十五日接替榮休的陳日君樞機成為香港教區主教。

香港與中國教會及中國政府的關係

湯樞機認為，教宗在二零零七年寫給中國天主教會人士的信，為中國教會的工作指出了優先次序。其中尤為重要的是促進在中國的不同群體

之間的和解與團結，以及促使他們與普世教會和教宗共融，至於對神父、修女、修生和教友的培育亦不應忽視。湯樞機要求所有在中國的信友都應細讀及正確理解教宗的信。他指出，「任何人就不應該對這封信作出偏頗的解釋，它必須被完整地接受。我很高興此信的綱要已經出版，作為閱讀和評論的指引。」在與中國教會的關係上，湯樞機說，香港不只是給予的一方，也是接受的一方，雙方彼此增益。許多教友到中國去旅遊，給予中國的兄弟姊妹良好的影響和嶄新的思想。

另外，愈來愈多的內地信徒和神職人員來到香港，而教區在湯主教的領導下成立了特設委員會，妥善歡迎內地的信徒和神職人員，並為他們舉辦一些有意義的牧民體驗。他們參觀一些使他們獲益的聖堂，參與各項牧民活動，探訪教區組織例如教區禮儀委員會、教理中心、醫院牧靈部等。一些香港的神學教授獲准在中國神學院任教，但數目比以前減少了。卻有愈來愈多的香港

神父和修女被邀請到中國內地，主持避靜、提供靈修指導和舉辦神修聚會。湯漢被擢升為主教

後，他在二零零九年四月十六日的新聞發佈會上作公開聲明，表明他在中國政治事務的立場：在沒有隱藏或犧牲自己的原則下，他對眾人抱持開放與溫和的態度，這亦是教宗的信中所表達的。

二零一二年三月，在擢升為樞機後，湯漢獲得機會陪同德國埃森主教到廣州作一天的訪問，他說：「我的中國之旅必須以非常謹慎的方式進行，因為仍有中國的主教被關在監獄裏。我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是我的兄弟，我會一直關心和尊重他們。」

我記得一九八五年，當我陪同胡振中主教訪問中國時，我們一再要求與仍被拘留獄中的上海主教龔品梅見面。（當時尚未知道他已是教宗『默存心中』的樞機。）因此，中國當局早已對我們的期望有所瞭解。我們不只是到中國去旅遊或去與官員應酬。我們要關心我們的兄弟姊妹，因為他們的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正受到限制。」

湯樞機的話

湯樞機說：「除非當局允許我們的兄弟姊妹和教會享有充份的宗教自由和人權，雙方不可能發展全面的關係。我們有責任在這些問題上盡力啓迪中國政府。同時，我們遵循梵二的精神：只有對話才能解決衝突。鬥爭和仇恨永遠不能帶來正面的改變。這是我在羅馬攻讀神學時，從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中學到的。」

他又說：「我自覺是個溫和的人。我跟從中國名言、亦是拉丁文的一句名言：中庸之道就是德行。我認為溝通和對話為每個人是十分重要的。當我談及溝通的時候，我所指的不只是溝通的技巧，更是人際的溝通。我發現既給予亦接受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我是一個簡單而普通的人。如果有可能，我期望為別人多做一些善事，正如詠23:6 所說：『啊，在我一生歲月裏，幸福與慈愛常隨不離。』」

